

乌合之众2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和政治心理学研究

〔法〕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著

王媛 译

台海出版社

乌合之众2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和政治心理学研究

THE CROWD 2

[法] 古斯塔夫·勒庞 (Gustave Le Bon) 著

王媛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合之众. 2 / (法) 古斯塔夫·勒庞著; 王媛译

.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68-1368-3

I. ①乌… II. ①古… ②王… III. ①群众心理学—
研究 IV. ①C9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7653号

乌合之众.2

著 者: (法) 古斯塔夫·勒庞

译 者: 王 媛

责任编辑: 高惠娟 贾凤华

装帧设计: 肖 杰

版式设计: 马延利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4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168-1368-3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THE
CROWD

革命心理学

Part 1 革命的心理因素

革命的一般特征 / 003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 003

民众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 008

革命的主流心理形态 / 018

革命中个体人格的变动 / 018

神秘主义心理和雅各宾心理 / 025

革命心理与犯罪心理 / 032

革命大众的心理 / 035

革命议会的心理 / 041

Part 2 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缘起 / 047

历史学家看法国大革命 / 047

旧制度的心理之基 / 056

大革命时期的精神：无政府状态及哲学家的影响力 / 062

理性、情感、神秘主义和集体等的影响 / 070

制宪议会的心理 / 070

立法议会的心理 / 080

国民公会的心理 / 084

国民公会期间的法国政府 / 092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 / 098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 / 104

传统和革命原则的冲突 / 113

无政府状态的苟延残喘：督政府 / 113

执政共和，恢复秩序 / 122

近一个世纪传统与革命原则冲突的政治后果 / 127

THE
CROWD

政治心理学

政治生活的心理原因 / 137

法律本源和立法幻想 / 137

法律之祸 / 142

可怕的政治力量 / 147

国家主义即神权在近代的变化 / 152

战争的心理要素 / 157

发生经济冲突的心理因素 / 165

大学教育产生的心理影响 / 167

民治政府 / 175

精英与大众 / 175

怂恿从何而来 / 184

工人的心理态势 / 189

民意的新形式 / 195

议会丧失民心与竞卖加价法 / 201

专政政治的进步 / 209

动乱的发展与反对社会解体的纷争 / 216

社会的动乱 / 216

犯罪的发展 / 225

社会争斗 / 233

近代宿命论与命数解析 / 238

社会防御 / 247

THE CROWD

革命心理学



Part 1

革命的心理因素

革命的一般特征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

革命的类别

通常情况下，“革命”指的是突发的政治变革。实际上，这个词无论在信仰、思想还是学说领域，都包含了所有突发性变化，或者是表面上的变化。

至于理想、情感和神秘主义在对大众行为产生影响的意见和信仰的源起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不再详述，我们在其他地方考察过了。

尽管革命到最后有可能转化为信仰，但它一般以反抗暴政、被人抛弃的专制政权或不得民心的国王等形式出现，在理性的驱动下爆发。

然而，有一点不要忘了：就算革命的起因也许合乎情理，除非理性因素在革命准备的过程中能转为情感因素，否则也很难对民众产生多大的影响。

可以说，用理性逻辑来影响群众，就算能把濒临倒台的暴政公之于众，效果也是微乎其微。反倒是那些给人的行为带来动力的情感和神秘主义因素更能对大众产生作用。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哲学家们利用理性的逻辑揭发旧制度的不合理性，以此激起人们渴望变革的

诉求。神秘主义逻辑则借助社团机构吸纳成员，按照一定原则的运作，促使彼此的内在信仰产生共鸣。情感方面的逻辑则为人们长久以来无法释放的激情找到出口，而且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大众的暴行。集体逻辑掌控着俱乐部、议会等机构，促使成员做出无论是理性、情感或者是神秘主义逻辑都不会让他们干的恶行。

不管革命是怎么发起的，只有当它深入到大众的内心深处，才可能结下累累硕果。紧接着，在大众特殊心理的作用下，革命事件也会以相应的特殊形式存在。因此，当我们彼此在谈论一个运动的时候，其他运动也就不难理解了，这也说明群众运动已经具备了显著的特点。

所以说，大众并非革命的出发点，只是代理人，他们通常以一种无组织的形式存在。如果没有领袖的话，人们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也难以成就大事。人们本身是创造不出刺激因素的，但是他们一旦受到刺激，就会很快超越自身。

有些突发性的政治革命虽然给历史学家带来巨大的震撼，但其实它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只有来自行为和思想深处的革命才是伟大的革命。再怎么去改变政府的名头，推翻民族的制度，都是无用的，无法改变一个民族的心态，也就无法让灵魂获得新生。

真正能改变大众命运的革命往往进展很慢，甚至历史学家们也很难察觉出它们的起始时间。所以说，与“革命”相比，“进化”这个词更适合用在这里。

当我们深入研究革命的起源时会发现，如果要对革命进行分类，上面谈到的要素显然是不足的。当然，如果只是从革命对象的角度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

科学革命

科学革命虽然总是被人忽略，却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革命。它的

影响十分深远，这一点政治革命是没法达到的。即使我们现在还无法深入研究科学革命，也要对它优先考虑。

举个例子，自大革命时代以来，天文学上的发现和试验方法的应用使得我们的宇宙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用“进化”来形容这种进展缓慢的革命显得更合适。对于另一些以各种形式取得同样效果的科学革命，它们的进展之快，完全配得上“革命”之名。比如短短几年就颠覆整个生物学界的达尔文理论；引发医学界重大变革的巴斯德的发现；还有将原子拉下神坛、贴上宇宙万物衰亡法则标签的物质裂变理论。

我们的情感和信仰对这些在观念领域内发生的纯知识性的科学革命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无从批判它们，它们的结果得到实验的验证，我们只能无条件服从。

政治革命

下面我们谈谈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者和科学革命没什么关系，它们给文明带来的推动力也远不及科学革命。神秘主义在这里起到了巨大的支配作用，而作为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理性因素对宗教和政治革命的起源几乎没什么用。

情感和神秘主义支配着人们的信仰，因此，宗教或政治信仰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无意识行为，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理性都无能为力。这点我在《意见与信仰》中已有阐述。此外，我还谈到，信仰总是强烈到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抗衡。对于信徒而言，信仰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至于它正确与否，并不要紧。他们接受了信仰的催眠，成为忠诚的信徒，为了信仰，随时都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幸福甚至生命置之度外。人们坚信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这使得信仰拥有掌控人们思想的强大力量，而只有时间才能消解这种力量。

在人们眼里，信仰就是绝对真理，这也就意味着信仰是狭隘偏执的。因此，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总是伴随着暴力、仇视和迫害，尤其像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

只有认识到信仰有着情感和神秘主义的起源，才能读透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神秘主义的信仰使得人们在交往中互不包容，矛盾重重。

如果我们忽视了信仰的起源，忽视了它的不宽容，忽视了人们交往过程中难以解决的矛盾，忽视了神秘主义信仰的强大力量，那么将无法理解大革命的某些阶段。

但是，历史学家们仍然试图继续采用理性逻辑解释一些与理性无关的现象。毕竟上文几个概念或许过于新奇，还不足以让他们的思想有所改变。

拿宗教改革来说，理性的逻辑并没有赋予它在半个世纪里席卷法国的强大能量。可是，即便在最近的作品中，还是有人运用理性的逻辑进行解释。在拉维斯和朗鲍德二位先生合著的《通史》一书中可见一斑：

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人们以各种形式融入这场遍及全国的自发运动中。这说明了个人拥有虔诚的道德心和果敢的推理能力。

我们的结论和这些历史学家相反：第一，这一系列的运动并非自发；第二，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并没有发挥能量。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源于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因素，既非理性塑造，也不受理性牵引，这使得它们拥有撼动世界的强大力量。

政治革命可能由人们的信仰引发而来，但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可以概括为“不满”。伴随情绪的膨胀，反对派逐渐形成，甚至强大到足以反抗政府。

“不满”必须经历长时间的累积才会爆发，因此革命往往呈现连续状态。并且带有一定的加速度，不可能一个阶段戛然而止，另一个阶段紧跟着到来。然而，当代几乎所有的革命都在瞬间爆发，如发生在巴西、葡萄牙、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转眼就推翻了政府。

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有些民族恰恰因为保守，往往倾向于最激烈的革命。他们拒绝缓慢的进化，无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游刃有余。因此，当矛盾不可避免时，他们总是选择瞬间突变。革命便由此产生。

即使在那些适应渐进演化的民族里，也难以阻挡革命的到来，正如在英国上演的一幕：君主将绝对权力紧握在手，而人民则主张以代表为媒介争取自主，最后是1688年的革命为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纪斗争画上了句号。

向来都是上层人士发起大革命，但当底层人民摆脱束缚后，革命的威力就转移到人民那里。

军队的中坚力量显然是支持革命的，没有他们，就没有革命。当路易十六的军队拒绝听从命令时，王权就已经开始丧失，而不是在他被送上断头台之后。

精神传染造成了一种后果：现存秩序的存亡对于渐怀叛心的军队来说无关痛痒。就希腊和土耳其的制度而言，两者不存在什么类似的地方，但希腊军官效仿少数军官推翻土耳其政府的行动，追随他们的脚步，重建希腊政权。

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国政府基本都是因为军事政变垮台。虽然推翻政府可以依赖于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如果不借助普遍的不满和广泛的希望，革命不可能取得成功。

不满必须要到达普遍而强烈的地步才能引发革命。革命领导人若不具备百折不挠的勇气，很难能唤醒整个民族或其大部分人。这些领导人向愤怒的人群呐喊，告诉他们当下的所有苦难及永远的匮乏都是

当前的政府造成的。他们放大大群的不满，然后信心十足地向他们保证：幸福的时代必须依赖于我们提出的新制度！于是，这些思想在暗示和传染下四处传播，革命也就应时而生了。

借助这种方式走向成熟的有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当然，后者无须花费太多时间，前者则相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很快有了自己的军队，但基督教花了很长时间才具备这些条件。起初，下等人、穷人以及奴隶是基督教仅有的信徒，他们对今世的悲惨能换来来世的幸福满怀热情。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教义自下而上传染到国家的上层，然而，如果没有经历漫长的岁月积淀，宗教信徒还不足以多到令一国之君将其定为国教。

民众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民族精神与刚柔

就理论而言，一个人是完全可以否认过去的，并且现在还有很多人仿效，但必须承认的是，历史的影响是不会消失的。只有理解了一个民族的环境和它的历史，才能理解这个民族特定时期的历史。

民族精神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由思想、情感、惯例和偏见慢慢积累并融合而成的。它给了一个民族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民族将徘徊不前，每一代人都得重新开始。

民族精神的建立和发展有赖于构成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所拥有的刚性。当然，这种刚性要有一定的限度，必须兼具柔性。

刚性使得先辈的精神得以继承，而柔性让民族精神得以适应因文明进步带来的环境变化。

自然界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任何物种如果一味固守旧形态，不能适应新环境，难免自取灭亡。人类也是

一样，一种民族精神如果柔性太大，就难以引发革命；反过来，如果太僵化，难免要走向没落。

然而，除了古罗马和当代英国可以说能很好地平衡刚性和柔性，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在这一对矛盾品性中做到完美恰当的平衡。

那些精神极其稳固持久的民族常常爆发激烈的革命。他们很难通过逐渐演进来适应环境，当不得不做去适应时，他们只能瞬间打破一切，向自己猛烈开炮。

民族精神的刚性是无法速成的，一个民族的历史本身就是民族精神诞生孕育的过程。一个还没有形成民族精神的民族，不过是一个零散的、蒙昧的游牧部落。从罗马帝国末期法兰克人入侵开始，法兰西用了好几百年才塑造了独特的民族精神。

然而，在数百年的演变发展中，法兰西的民族精神显得柔韧性不足。也许再柔韧些，古代君主政体就能像其他地方一样能够和缓地发生变化，国家也就无须面对大革命所带来的严重破坏，民族精神也就不难重建了。

上面的探讨为我们点明了大革命在民族方面的原因，也解释了同样的革命在不同的国度里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命运。民族精神的不同，导致不同人对法国大革命持不同的态度，有的热烈欢迎，有的冷漠对待。

英国曾发生两次革命，送了一位国王上断头台，但仍旧秩序井然。它的刚硬足以让他从传统中汲取精华、它的柔韧又足以在一定范围内修正自身的民族精神。英国人从来不像我们幻想着用理性彻底和传统划清界限，建立新社会。

索列尔说过：“法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和法律、牧师和贵族不屑一顾，而宗教、宪法、贵族制和上院在英国人眼里象征着荣耀，它们如同那令人望而却步的巴士底狱里的塔楼，谁敢擅自闯入，将被处以蔑视罪。

虽然城堡内的命令确实存在争议，但在英国人看来，这不足以成为陌生人干涉的理由。”

西班牙语系的南美各共和国历史充分地揭示民族精神对民族命运的影响。他们的混血儿身份使得民族难以形成自己的精神，杂乱的遗传冲淡了祖先的特质，在这些混血种族里难以实现稳定的统治。因此，这里成了革命和政变的频发地。

如果我们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政治能力与民族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对于那些曾受两个不同民族统治的国家进行考察。

晚近时代的古巴和菲律宾就属于这类国家：他们先是听命于西班牙，后来又接受美国的统治。

看看古巴，西班牙统治期间，国家混乱，贫困丛生；美国统治期间，却变得很繁华。

菲律宾也不例外。在西班牙数个世纪的统治下，菲律宾灌木杂生，疫病蔓延，没有工业和商业，人们在这个糟糕的国度里过着悲惨单调的生活。美国接手以后，在几年的时间里竟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疟疾、黄热病、瘟疫以及霍乱被成功消灭；沼泽地得到治理；铁路、工厂和学校让农村焕然一新；人口死亡率在13年间降了三分之二。

所以说，民族这个词的内涵不容忽视，更不能忘记民族的精神对其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希望这些实例可以给那些理论学家们提个醒。

人民看待革命的角度

人民在革命中只受领导支配，他们不会发动革命，也不会领导革命，这在所有的革命中都一样。

当直接利益受到威胁时，人民才可能自发反抗。正如最近香槟省事件，当然，这只能形成一种地方性的小骚动。

葡萄牙和巴西新近发生的革命表明，当领袖有巨大的影响力时，

革命很容易发生。但是，人民总是在慌乱懵懂中就接受革命。他们接受新思想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当革命早已结束后，也许才能碰巧领悟了革命的意义。

正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人民参加革命的激情并不是因为他们理解革命领袖的想法，而是受到了革命领袖的鼓动。人民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解革命的方式，并且和革命发起者的目标相去甚远。

法国大革命的目标其实是要让精明能干的新精英取代平庸无能的旧精英，把权力从贵族手中转移到资产阶级那里。

大革命的首个阶段虽然公布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也只是给了人民选举代表的权利，革命的议题几乎和人民没有什么关系。

普通百姓大多是文盲，他们从不敢像中产阶级那样渴望自己一跃成为贵族，更不敢奢求、甚至是认为自己与贵族平等。从观点和利益看，上层阶级和老百姓之间如天地之隔。

民众是议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所以民众越陷越深，致使资产阶级革命很快地变成一场大众革命。

如果没有情感和神秘主义的支持，思想本身是缺乏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理论如果无法根据现实利益转化成另外一种明确的新信仰，不会对普通民众产生多少影响。

当人民从政府口中得知自己可以和旧主人平等时，思想的转换立见成效：人们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遭受压迫的受害者，于是开始烧杀抢夺，并将这看作行使权利的方式。

这就是革命原则的强大力量，它们释放了那些原本受到环境、传统和法律束缚的野蛮本性。

原来存在群众心中的社会约束逐渐褪去，群众慢慢地自大起来，到后来更是无法无天。无限权力的观念让他们晕头转向，他们乐于看着旧主人被掠夺驱赶。既然主权在握，还有什么不能干的。